

排滿論再考

林 義 強

本文着重研究清末排滿論從民族論向體制論的轉向過程，通過對「排清論」的發掘與強調，試圖對清末國學與辛亥革命的結果作出更為合理的解釋。

早期排滿論是一種鼓吹民族淨化的復讐論。但在經過『民報』對『新民叢報』的論爭之後，排滿論開始修改其「滿漢」、「華夷」的對立論式，並將排除範圍縮小到包括漢族官僚在內的特權階層，其基調已從「排滿」暗中轉向「排清」。章炳麟的建國理想與劉師培的無政府主義是促成他們完成這一轉變的重要因素。在章炳麟與嚴復、楊度的論爭中，滿漢問題實際上已不再是問題的核心，取而代之的則是對民族主義原理與認同意識的爭議。章炳麟從美國的族群架構中得到啟發，將「中國人」從與漢族同等的概念提昇為合「漢滿蒙回藏」為一體的上層概念。在此之上，章炳麟形成了「文化」、「民族」、「國家」「三位一體」的新國家定位，並由此將排滿論的目的從「民族」移向「民國」。在其論述中，歷史與語言不僅是畫定國境的依據，同時還是建制大政的指南。

在清末最後幾年裡，以「排滿」為旨的排滿論實際上已走到了不得不轉向的盡頭。這一轉向對清末國學的論題產生了直接的影響，並促使其重心以更大的幅度傾向學問研究，民族問題重新歸入文化問題。辛亥革命也因此奠定了只「排清」不「排滿」的理論基礎，從而最終避免了民族虐殺或民族淨化的惡果。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辛亥革命並不意味着排滿論的勝利。